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5.007

#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互文性范畴研究

项蕴华,魏茜茜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互文性是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互文性理论发展初期,国外学者首先将互文性划分为明示互文性和构成互文性。随后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分别论证了互文性不仅是进行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也是权力在语篇中得以实现的重要工具;同时,互文性也可有效揭示语篇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国内学者则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具体互文性和体裁互文性、篇际互文性、媒体互文性等概念,细化和完善了互文性的分类。国内外学者关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折射出互文性映射语篇间关系、表现形式多样、再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點。鉴于互文性疏于对多模态语篇的探究、研究范式固化等不足,可采用不变与变的辩证思维对互文性进行修正,在互文性实践中可从理论融合和多模态研究范式两个方面加强对互文性的理论建构。未来互文性在中国的实践研究应增加对反映中国文化或社会问题的语言模态汉语语篇、多模态汉语语篇及大规模样本的定量分析的研究。

**关键词:**批评性语篇分析;互文性范畴;辩证思维;不变与变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5-0045-08

自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诞生以来,相关学者在夯实自身学科地位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丰富和完善本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引进。互文性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Kristeva于1969年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sup>[1]</sup>。互文性最早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研究语篇与语篇以及语篇与社会的互动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CDA主要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揭示语篇的深层意义及潜在的意识形态。因而,互文性得以成为CDA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重要范畴。CDA领域内的互文性分析成果较为丰硕,却鲜有从理论层面对互文性范畴的系统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CDA主要代表人物的互文性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梳理,总结该理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中国新时代的语境对其应用提出建议,以期促进CDA视角下中国语篇的互文性研究。

## 一、国外批评性语篇分析学者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互文性以符号语言学观和对话理论为基础,受到语言学家Saussure和文艺学家Bakhtin观点的影响。互文性最早由国外学者Fairclough等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CDA领域。当前,国外CDA领域的互文性研究以Fairclough、Wodak和van Dijk的成果最为突出,他们分别对文学批评领域的互文性理论加以改进,最终形成了CDA领域内适用于不同研究流派的互文性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本节主要对以上几位代表人物在CDA领域的互文性理论和互文性实践进行简要介绍。

### (一)Fairclough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互文性在Fairclough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Fairclough指出互文性可用于揭示语篇实践层面话语事件的复杂性<sup>[2]</sup>。具体来讲,互文性分析是从语篇实践层面对文本进行的研究,可探究语篇的话语秩序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语

收稿日期:2024-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评性语篇分析范畴的理论创新研究”(18BYY220)

作者简介:项蕴华(1967—),女,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茜茜(1991—),女,河南遂平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篇的形成建立在吸收、重构或改写历史语篇的基础之上。正是语篇的历史性使互文性分析成为CDA的焦点之一,Fairclough把互文性分为明示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构成互文性或互话语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或interdiscursivity)<sup>[3]10,270</sup>。前者指一个语篇中明晰地标记或暗示存在其他语篇的具体片段,后者是对某个语篇中不同语篇类型或语篇规范组合的研究。后者以前者为前提。Fairclough的互文性厘清了语篇间的关系,为互文性在CDA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学者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参考。

Fairclough先后提出三维分析框架和五步分析框架,不断完善对互文性的实践。通过探究互文性在语篇中的应用可能性、互文性的作用、互文性的理论框架等,他更好地揭示了语篇中的互文性在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Fairclough以大学的招聘广告、学术会议材料等学术语篇为例,通过互文性分析,揭示了社会变革对机构语篇的影响,阐述了当代英国公共语篇市场化的现象<sup>[4]102</sup>。对英国福利改革语篇中的互文性研究则表明互文性是进行社会变革的有效舆论手段<sup>[4]167-193</sup>。由此可以看出,互文性不仅可以折射社会变革对政治语篇、新闻语篇、教育语篇等的影响,也是进行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

### (二)Wodak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互文性是权力在语篇中得以实现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权力可以借助语篇的语言形式来体现,另一方面,话语的差异受到权力差异的控制,而权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由语篇和体裁控制<sup>[5]10</sup>。Wodak和Meyer通过对互文性和互话语性的分析揭示了语篇间的关系,探究了权力在语篇中的实现形式及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互文性指当前语篇与过去或现在的其他语篇相关联,例如,明确地提及一个话题或主要行为者或相同的事件等<sup>[5]90</sup>。然而,语篇并不是封闭的,不同语篇间多样且相似的联系方式被称为互话语性。互话语性既体现为不同语篇间的话题相关,也体现为文化相关、体裁相关等。Wodak将互文性和互话语性视为再情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sup>[6]</sup>。二者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语篇写作者的真正意图,揭示隐含在语篇背后的权力关系。

历史语境下语篇的互文性和互话语性的实践研究贯穿语篇-历史分析方法,揭示了语篇、意识形态和社会尤其是政治之间的关系。互文性和互

话语性是Wodak等对移民和难民问题进行研究的得力工具。奥地利优先请愿活动旨在限制移民以保障奥地利公民的权力<sup>[7]11</sup>。一方面,Wodak和Meyer运用互文性理论揭示了该请愿参加者对移民的排外情绪<sup>[7]11</sup>;另一方面,Rheindorf和Wodak对奥地利报纸上关于难民问题的语篇从互话语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相关语篇可以分为两个主题,一类主题与基督教社会党主张在奥地利边界设置围栏相关,另一类主题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主张限制难民数量<sup>[8]</sup>。两党对待难民的不同主张折射出了他们的观念的差异。

### (三)van Dijk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van Dijk着重探究互文性如何有效揭示隐含在语篇背后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在互文性语篇中,先前的谈话或语篇内容被称为当前语篇的“旧信息”,具有全局主题(global topic)的功能;而剩下部分则为“新信息”,具有全局焦点(global focus)的功能<sup>[9]238</sup>。两种功能贯穿整个语篇。先前语篇的语境、情景模型及互文的共同基础是建构当前语篇新知识的前提,也是认知当前语篇的基础<sup>[9]304,308</sup>。互文性分析可以探究参与者如何在复杂的参与或互动结构中选择恰当的语篇或谈话来表征自己和他人<sup>[10]133</sup>。互文性分析使研究者能够更明晰地揭示语篇所要传达的作者价值观,剖析语篇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问题。

van Dijk认为在进行CDA的互文性分析时,不仅需要分析语篇互文性的作用,也要着重探析互文性语篇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他主要关注政治语篇中的互文性研究,如通过对西班牙内政部长驱逐“非法”移民讲话的分析,揭示了互文性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如何使驱逐移民的行为变得中性化而更易接受,有助于大众对语篇隐含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体现了互文性较强的阐释作用<sup>[11]</sup>。在互文性的功能研究方面, van Dijk通过对政治语篇中互文性的分析,揭示了互文性如何发挥关联功能,使当前语篇和相关语篇产生关联<sup>[9]238-239</sup>,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政治语篇背后所蕴含的目的。

## 二、国内批评性语篇分析学者对互文性的阐释和实践

近年来国内CDA领域成果丰硕,而在该领域有关语篇互文性的研究方面,则以辛斌、武建国、毛浩然为主要的领军人物。他们或以国外CDA

学者的互文性理论为基础对该理论进行完善、扩充,或从传播渠道、语篇策略的角度对互文性进行重新分类。本节主要对以上三位领军人物及其团队的互文性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介绍。

### (一) 辛斌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辛斌最早把互文性引入到国内批评性语篇分析领域,并在 Fairclough 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语篇互文性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文本、语篇、机构层的体裁互文场、整体社会层的体裁互文场四个分析层面,后三个分析层面分别与情景语境、机构语境和文化语境一一对应<sup>[12]vi</sup>。辛斌将语篇的互文性分为具体互文性(specific intertextuality)和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具体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与该语篇中包含的有具体来源(具体的个人、组织或匿名)的句子、段落所在语篇的互文关系<sup>[12]93</sup>,具体互文性分析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才能使读者更加清楚地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例如引用、参考、用典、言语转述、提及、回应、陈词、预设等<sup>[13-14]</sup>;体裁互文性指不同的体裁、类型或语域融合在同一个语篇中<sup>[15]</sup>。每个互文语篇的体裁、类型等都代表着特定群体或阶层的观念。

辛斌指出互文性是 CDA 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其互文性实践主要聚焦有关中国问题的语篇,探究语篇作者如何通过体裁互文性和具体互文性促使读者接纳其观点,实现交际意图,揭示语篇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sup>[16]</sup>。辛斌和李悦通过对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演讲语篇的具体互文性对比研究,指出两国领导人使用的具体互文性手段虽然稍有差异,但是都寻求认同与合作,有助于加深大众对演讲语篇的理解<sup>[13]</sup>。在国家形象的研究方面,通过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2015年中国 9.3 阅兵报道”的体裁互文性分析<sup>[17]</sup>,辛斌阐述了报道背后隐含的美媒对华态度,揭示了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二) 武建国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相比于辛斌对互文性的细化研究,武建国更注重对篇际互文性的深度剖析。他认为,篇际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存在不同体裁、风格、话语的融合与混杂<sup>[18]</sup>。他指出,篇际互文性可以从横向组合(确定语篇中涉及了哪些体裁、风格、话语等)与纵向聚合(已确定的体裁、风格、话语等如何在语篇中交织融合)两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从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出发,篇际互文性又可分为

融合型、转换型、链接型和镶嵌型四个类别<sup>[19]</sup>。篇际互文性具有顺应性和功能性<sup>[20]</sup>,顺应性可以更好地解释篇际互文性的生成动机,而功能性则有助于明晰语篇实践的运行机制及效果。在武建国看来,篇际互文性是对体裁互文性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全面解读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丰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体系。

武建国及其团队的互文性实践着重从语篇的体裁视角出发,对语篇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度探究。如武建国等学者将 Bhatia 的分析模式和 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相结合,对世界 500 强的中国内地公司简介进行分析,指出篇际互文性在公司简介中普遍存在且具有重要的语用功效<sup>[21]</sup>。同时,多学科理论的联合运用拓宽了篇际互文性的应用范围,迎合了新文科的发展潮流。多媒体的迅速发展也为互文性的应用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武建国等学者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把目光投向新媒体,以微博语篇为例,对其中的互文性进行分析,对新媒体语篇和政治话语的研究与传播具有启发意义<sup>[22]</sup>。

### (三) 毛浩然对互文性的阐释与实践

毛浩然未囿于国内外学者们关于互文性的阐释,而是从传播媒介的视角对互文性进行横向拓展研究。他指出互文性是语篇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可使读者在阅读当前语篇时主动搜索大脑中与之相关的其他语篇,激活相关的语篇记忆和文化背景知识,得到除当前语篇之外的信息<sup>[23]</sup>。毛浩然提出,从传播渠道来看,互文可分为单一媒体互文(某一类别的媒体针对特定的事件、话题等进行的一系列新闻报道语篇之间的互文)和多元媒体互文(不同类别的媒体针对同一个事件、话题等所进行的新闻报道语篇之间的互文)。从语篇策略角度,互文可分为类比互文、故事互文、引用互文、群体互文、主线互文、理据互文、意图互文、受众互文、方案互文 9 个类别。如引用互文指通过引用名家言论、权威资料等方式增强说理的可信度、趣味性等<sup>[24]</sup>。该互文性理论结合了当前融媒体的大背景,更加侧重从受众和互文语篇的传播渠道角度挖掘互文性在语篇中的作用,帮助读者更精确地解读作者的真实意图和隐含的意识形态,也可作为语篇策略引导和提升读者对语篇传达的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在实践中,对新闻语篇具体内容的互文性研究逐渐延伸到对相关新闻事件标题互文性的探

究。毛浩然和徐赳赳通过对有关“邓玉娇事件”新闻标题的分析,揭示了新闻标题中单一媒体互文和多元媒体互文的特征,为互文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sup>[23]</sup>。同时,互文性作为语篇策略在语篇中的作用也是其研究的重点。陈臻渝和毛浩然通过对《朝日新闻》“森友学园”事件新闻标题的跨版块高频词和监察方词块的互文性分析,探究了媒体如何通过互文性策略构建中立的媒体形象,引领受众接纳其观点,丰富了互文性的研究话题<sup>[25]</sup>。

### 三、互文性的理论创新研究

由上节可知,自互文性被引入 CDA 以来,国内外学者分别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总体来看,CDA 视角下的互文性呈现出映射性、多样性、再现性的特点。

一是映射性特点。互文性是对语篇之间关系的映射。互文性使当前语篇与其他语篇产生关联,其他语篇佐证了当前语篇的观点,使其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当前语篇中具有出处的句子或段落可以直接反映出语篇间的关系。互文性研究者着眼于从全局角度研究当前语篇与互文语篇之间的关系,全面挖掘当前语篇作者的写作意图,使语篇分析更具科学性和理据性。

二是多样性特点。互文性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语篇与语篇间的互文关系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进行表达。这种形式既可以由当前语篇中的具体文字直接呈现,也可以由当前语篇和语篇中某些文字所代表的不同体裁类型来间接呈现。例如,Fairclough 将此类直接呈现方式称为显著互文性,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元话语、反讽、否定等<sup>[3]118</sup>。他将后一种间接呈现方式称为构成互文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体裁、活动类型、风格等。

三是再现性特点。互文性是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再现。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不同语篇中所提及的同一个事物或事件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因此,语篇分析者只有对互文语篇所涉及时段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回顾与解析,才能更加精准地把握当前语篇作者的写作意图。如辛斌、李悦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演讲语篇中对双方的历任领导人语录及谚语等进行了引用<sup>[13]</sup>,只有对这些语录和谚语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对这些具体互文手段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进行正确

阐释。

纵观 CDA 学者对互文性的阐释和实践,虽各具特色,但在将其应用到中国语境下的语篇时仍有改进和完善的空间。首先,就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CDA 代表人物是在西方背景下对互文性理论进行引介和改进。因此,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互文性理论必然具有较强的西方思维特色。而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使用方式上,也会影响互文性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其次,从时代的发展趋势来看,互文性是早期 CDA 学者从文学批评领域引介而来,其对书面语篇之间互文关系的高度关注也为 CDA 学者们所延续。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语篇呈现渠道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多模态语篇层出不穷,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CDA 学者们对互文性的阐释和实践多是针对书面语篇,对于具有不同体裁特点、表现形式、传播效果的多模态语篇并不完全适用。最后,聚焦 CDA 视角下的互文性研究可以看出,国内 CDA 学者的互文性研究大多遵从国外的研究模式,多是对书面语篇中政治问题的犀利批判,难以得出创新性的结论,更无从真正揭示中国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若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照搬国外 CDA 学者的互文性理论和研究模式无疑会造成研究的同质化,也无益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在积极引介国外理论的同时进行辩证思考,灵活地把握变与不变的尺度。

这种辩证思考不是对互文性理论的全盘否定,也不是不加修改的生搬硬套,而是摘取互文性理论中与中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部分,对不足的部分进行改进或补充。因此,CDA 的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需要辩证把握不变与变的关系。具体来看,“不变”主要表现为 CDA 通过语篇研究社会变化,揭示社会问题的研究宗旨不能变。引入互文性理论是为了更为高效地达到 CDA 学者的研究目的,揭示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不能为了追求理论的创新,盲目地对互文性理论进行改变,而不顾 CDA 的最终研究目的。否则,只是舍本逐末,不利于 CDA 的发展。因此,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必须始终以 CDA 的研究宗旨为核心。“变”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因地而变。西方背景下引介的互文性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具有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的中国语篇的分析及中国特殊社会问题的探究,需要随

着研究语篇地域的变化,从其他理论或本土文化中汲取灵感,进行整合和改进。第二,因时而变。时代的发展促使许多新的表达方式的产生,互文性理论只有不断地更新其理论内涵,才能够为日益新增的语言表达方式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阐释。此外,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多模态语篇的出现打破了语言模态语篇信息传播渠道单一的局面,这就需要互文性理论统筹考虑语言模态语篇和多模态语篇的特点,从而进行相应改进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 四、批评性语篇分析互文性实践研究

##### (一)互文性实践中的理论建构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学者关于互文性的阐释和实践的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出,互文性自被引入到CDA以来,显现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研究热度不断提升。但是,在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研究范式固化、语料单一等问题。笔者认为,今后CDA视角下互文性实践的理论建构方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

1.加强互文性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融合。目前,国内学者较多关注的是CDA和互文性理论结合的理论应用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较少。武建国等学者虽进行了尝试<sup>[21]</sup>,但国内CDA视角下的互文性研究仍以国外CDA的几位代表人物或辛斌的分析方法为主导<sup>[12]vi</sup>。鉴于时代发展的背景和学科间融合的趋势,CDA视角下互文性的理论建设可以借鉴语言学内部或其他学科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与自身理论进行融合,用以弥补自身理论在实际语篇分析时的不足。如在对语篇的具体互文性或显著互文性进行分析时,可以把认知科学的逻辑修辞模块融入其中。在对语篇的具体互文性进行研究时,学者们往往只是找出特定语篇中包含的具有明显标记的其他语篇的具体片段及一些不明显的包含其他语篇特征的转述片段,然后根据个人理解对这些找出的片段进行分析,造成分析过于主观,缺乏理论的支撑和说服力。而逻辑修辞模块,可以让学者们从内部连贯与外部连贯两个方面来探究语篇生成者运用该类互文性的目的,及其背后想要表达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学者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2.开拓对多模态语篇的互文性研究。当前,学者们对语篇互文性的分析多以文字模态的新闻语篇为主,忽视了近年来出现的多模态语篇。随

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也随之由原来的纸质报纸、书籍等逐渐转变成数字报纸、数字电影等高科技的方式。面对新媒体大背景下各种媒介符号的涌入,对语篇的互文性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文字模态语篇的分析,而是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对新出现的多模态语篇进行研究,丰富互文性的研究内容,开拓多模态语篇的互文研究范式,具体研究可以从互文性的概念内涵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着手。

(1)探究互文性概念的新内涵。互文性不仅指当前语篇对其他同类型模态(文字与文字、图像与图像等)语篇的借鉴与吸收,也涉及到当前语篇对其他不同类型模态(文字与图像、文字与声音等)语篇的摘引与融合。新媒体的兴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沟通、传递、接收信息的方式,也促使了多模态语篇的兴起。Kress和van Leeuwen、Baldry和Thibault及Halloran等认为多模态是用来构建语篇的多种符号资源<sup>[26]4,[27]4,[28]1</sup>。Adami把多模态定义为人们沟通中用来传达意义的不同资源<sup>[29]451</sup>。因此,如今的互文性研究也不应再局限于文字模态语篇之间的联系,而是应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对文字、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模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在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大环境下,互文性也需要相应地增加新的内涵。

(2)探究互文性分类的新方式。现有的研究多是对文字模态语篇之间的互文表现形式的探讨,对语篇中其他模态的互文性在揭示语言、权力等关系中所起的作用重视不足。因此,在前人对互文性表现形式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模态类型的角度将互文性的具体表现方式划分为同模态互文和跨模态互文两类。同模态互文指某语篇中同一类型模态间的互文,例如文字与文字之间、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互文等;跨模态互文指语篇中不同类型模态间的互文,例如文字与图像、图像与声音之间的互文等。

同模态互文和跨模态互文都对具有互文性的多模态语篇中的模态给予了足够重视。在多模态语篇中,文字模态只是多种可以传达意义的方式之一,不再是学者们研究的核心<sup>[30]</sup>。同样,王振华和瞿桃也指出多模态语篇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语篇中多种模态的研究<sup>[31]</sup>。由此可见,对多模态语篇中的同模态互文和跨模态互文进行探究具有必要性。互文性作用于语言使用的各个层面<sup>[32]</sup>。

因此,不仅需要多模态语篇中文字模态的互文性进行研究,还需要探究其他模态在激发多模态语篇互文性方面的作用。此外,在进行同模态互文和跨模态互文分析时,还需要从微观的具体模态类别和宏观的不同模态风格、语类等两个层面对语篇的互文性进行多层面的解读。

## (二) 中国语境下互文性实践的应用前景

自互文性引入到国内批评性语篇分析领域以来,国内学者多是运用该理论对国外的语篇或话题进行批评性语篇分析,仅有少量对汉语语篇的研究。当今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探究互文性在汉语语篇中如何反映中国社会问题、树立中国形象等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大对汉语语篇互文性的应用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利于扩大互文性的应用范围,提高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实用价值。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互文性进行应用。

1. 加强对反映中国社会问题或文化的语言模态汉语语篇的互文性研究。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反映国际热点问题的新闻语篇,很难据此探究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特殊社会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可加强对有关中国社会热点问题语篇的研究,如环境保护、中华民族的身份建构、新兴社会群体(如空巢老人、新生代农民工等)的身份建构,并从语言学的视角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此外,中国的一些经典作品中也蕴含着大量的互文性现象,但对该互文性现象的批评性分析却亟待加强。如吴柱对中国古代经典《周礼》中的互文性现象进行了具体分类和详细阐释,并提出了互文阅读法作为解读《周礼》的新路径<sup>[33]</sup>。由上可知,诸如此类关于中国经典作品中互文性现象的研究多局限于作品本身互文类型的解读,少有对此类作品中互文性现象的批评性分析。因此,今后不但需要加强对中国经典作品中互文性现象的解读,还需对其进行批评性分析,更正人们对中国经典作品中互文性现象的误读与误解,探究以中国经典作品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2. 增加对多模态汉语语篇的互文性研究。辛斌指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是21世纪批评话语分析的三大主要发展方向之一<sup>[34]</sup>。互文性作为批评话语分析探究语言模态语篇的得力工具,在

多模态语篇中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纪录片和电影是典型的多模态语篇,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互文性现象自然也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赵永华、韦佳玥、窦书棋和徐国帅、李亚楠分别对纪录片《这里是中国》和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中的互文性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互文性在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和诠释家国情怀方面的重要作用<sup>[35-36]</sup>。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变得密不可分,涌现出许多新媒体语篇,如新浪微博、博客、网络语篇、短视频、微信朋友圈、贴吧、网络论坛等。对此类多模态语篇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的变化,同时也使得语篇分析得以与时俱进。陈术合等学者探究了微纪录片《延安记忆》中的语图互文如何对延安精神进行创新性呈现,为主流价值在互联网时代的有效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sup>[37]</sup>。

此外,相声、小品、戏曲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表演也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语料。对此类语篇进行互文性分析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语篇互文性分析的范围。苏州评弹是中国口头文学说唱艺术的经典之一,是一种传统曲艺说书戏剧形式,可追溯到唐代,说表是主要手段,唱为辅助手段。沈家焯对经典弹词《杨乃武·密室相会》的对话与互文进行了分析,指出技艺高超的说书人其成功之处不是简单地遵循程式的制约,而是充分利用汉语的特点,将互文性自然地融入到说书人与听书人、书中人物与人物、听众和书中人物之间各个维度的对话中<sup>[38]</sup>。最后,其根据评弹中对话与互文的特点,提出了改善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具体建议。

3. 增加对大规模样本的定量分析。国内CDA学者的互文性分析大多以小样本的定性分析为主,主观性较强,缺乏说服力,极易因分析结果带有太多语篇分析者的主观思想而受人指摘。因此,在对话语篇的互文性进行分析时加入定量分析能够提升CDA互文性分析的科学性,弥补语篇互文性定性分析结果缺乏大数据支撑进而导致说服力减弱的不足。此外,加入定量分析可以减少定性分析时人工统计语篇中互文量的时间,提升科研效率。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势必给批评性语篇分析互文性的发展与应用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互文性范畴在批评性语篇分

析领域的地位也会愈加重要。本文简要追溯了互文性的理论起源,着重梳理了国内外批评性语篇分析主要学者的互文性阐释和实践,全面总结了互文性的特点,包括映射语篇之间的关系、表现形式多样、再现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同时指出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弥补现有互文性研究的不足,在互文性理论建构方面应辩证把握不变与变的关系。最后,结合已有的互文性实践研究,提出了今后互文性理论建构的发展方向及中国语境下互文性的应用建议。

### 参考文献:

- [1]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 [2]Fairclough N. Intertextualit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2(4).
- [3]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4]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5]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6]Wodak R. Complex texts: Analysing,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and interpreting meanings [J]. *Discourse Studies*, 2011(5).
- [7]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8]Rheindorf M, Wodak R. Borders, fences, and limits—protecting Austria from refugees: metadiscursive negotiation of meaning in the current refugee crisis [J].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2018(16).
- [9]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0]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1]Rojo L M, van Dijk T A. “There was a problem, and it was solved!”: Legitimizing the expulsion of ‘illegal’ migrants in Spanish parliamentary discourse [J]. *Discourse & Society*, 1997(4).
- [12]辛斌.语篇互文性的批评性分析[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
- [13]辛斌,李悦.中美领导人互访演讲中具体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16(1).
- [14]辛斌,李艳.社交平台新闻话语的互文性分析——以Facebook上有关南海问题的新闻为例[J].当代修辞学,2019(5).
- [15]辛斌.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
- [16]辛斌.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3).
- [17]辛斌.英语新闻语篇体裁互文中的语言过程——以美媒关于2015年中国9.3阅兵报道为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4).
- [18]武建国,秦秀白.篇际互文性的顺应性分析[J].外语学刊,2006(5).
- [19]武建国.篇际互文性研究述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2).
- [20]武建国,冯婷.篇际互文性生成动机的语用学诠释[J].外语学刊,2017(2).
- [21]武建国,陈聪颖,郑蓉.篇际互文性与公司简介的批评性体裁分析——以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公司为例[J].语言学研究,2018(2).
- [22]武建国,牛振俊,肖晓.政治话语在新媒体传播中的重新语境化和意义转换——以微博中的《公报》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3).
- [23]毛浩然,徐赓赓.单一媒体与多元媒体话语互文分析——以“邓玉娇事件”新闻标题为例[J].当代修辞学,2010(5).
- [24]毛浩然,林大津.商榷性评课话语的互文应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 [25]陈臻渝,毛浩然.日本反腐新闻标题跨版块互文分析——基于《朝日新闻》新闻标题语料库[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26]Kress G,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 [27]Baldry A, Thibault P J.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A Multimedia Tool Kit and Coursebook* [M]. London/Oakville: Equinox, 2006.
- [28]Holloran K 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M].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29]Adami E. *Multimodality* [C] // García O, Flores N, Spotti M.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0]Bernad-Mwchó E. Combining multimodal techniques to approach the study of academic lectures: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J]. *Journal of the Spanish Association of Anglo-American Studies*, 2021(1).
- [31]王振华,瞿桃.多模态语篇的评价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J].外国语,2020(6).
- [32]Farrelly M. Rethinking intertextuality in CDA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20(4).
- [33]吴柱.《周礼》互文释例发微——中国传统互文

视野下的文本内涵与《周礼》研究新路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34] 辛斌. 21 世纪的批评话语研究: 反思与展望[J]. 外语研究, 2020(4).

[35] 赵永华, 韦佳玥, 窦书棋. 媒体合作与国际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共同建构——基于《这里是中国》与 YouTube 网评的互文性分析[J]. 新闻春秋, 2023(4).

[36] 徐国帅, 李亚楠. 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的互文、阐释与话语新篇[J]. 电影评介, 2023(18).

[37] 陈术合, 田小波, 马战英. 人民视角、语图互文与青春语态——论微纪录片《延安记忆》对延安精神的表达策略[J]. 电视研究, 2023(7).

[38] 沈家焯. 对话与互文: 弹词《杨乃武·密室相会》语言分析[J]. 当代修辞学, 2024(2).

## Study on the Category of Intertextualit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XIANG Yunhua, WEI Xix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ntertextuality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foreign scholars firstly divide intertextuality into 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and 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 On this basis, they then argue that intertextuality is not only a powerful tool for social chan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realisation of power in discourse, and that intertextuality can also effectively reveal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injustice implied behind the discours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further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proposing such concepts as specific intertextuality and generic intertextuality, interdiscursivity, and media intertextuality to refine and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tertextuality.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done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refracts that intertextual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pping inter-discourse relations, diverse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reproducing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intertextuality such as neglecting the explora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s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we can adopt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invariance and change to revise intertextuality; we can als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textua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fusion and multimodal research paradigms in intertextuality practic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intertextuality in China should increase the study of linguistically modal Chinese discourses reflecting Chinese culture or social issues, multimodal Chinese discourse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sample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ategory of intertextuality; dialectical thinking; invariance and change

(责任编辑 合 壹; 实习编辑 郑安然)